



代
历
台阁名胜记选

历代台阁名胜记选



金涛声 选 注
陈自力 审 定
毛水清

广西人民出版社



历代台阁名胜记选

金涛声 陈自力 选注

毛水清 审定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1.875印张 插页2 263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50册

ISBN 7—219—01106—7/I·305

定价：4.00元

《古文类选丛书》总序

郭预衡

大概自从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了一部《文选》之后，历代都有一些文章选本。诸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在》以及《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之类，或包举一代，或囊括历朝，或兼收诗文，或区分众体。选者的眼光不同，选本的质量不一。但不管怎样，这些选本都存在了一定的时间，拥有一定的读者。古今来的书籍浩如烟海，专著专集难得尽，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些选本当然是很需要的。

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文章选本。而且分门别类，不一而足。仅以散文而论，就有《散文选》、《古文选》、《游记选》、《书信选》、《日记选》等等，出版这些选本，大概不一定完全是为了营利的目的，其中恐怕也有适应读者需要的因素。因为现在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要想阅读历代的文章，新的选本还是很需要的。

但作为文章选本，和全书全集相比，总是有缺点的，至少是有局限的。因为，选的作品很难全面。一般说来，从选本中很难看出一个作者的全貌，也很难看出文章的历史发展。鲁迅先生就曾认为进行研究不能依靠选本。鲁迅先生这个意见是从历来的选本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说得很对的。

不过，鲁迅同时又曾指出：选本的好坏，还要看选者的眼光。眼光不同，则其所选，也即不同。（《选本》大意）

由此我曾感到，如果选者真有眼光，那么，他的选本将不仅可供一般阅读，而且可供研究的参考。这样的选本不仅具有通俗读物的价值，也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现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拟出一套《古文类选丛书》，从其初拟的书目看，所包甚广。从历代辞赋、奏议、史论、赠序、笔记直到箴铭、志、不下三十种。作为选本的“丛书”，可谓洋洋大观了。

对于这套“丛书”，我抱有一种希望：既然包罗了历代的各体文章，我就希望每一选本多少都能反映一点各该文体的历史发展。例如辞赋，从先秦的屈原、宋玉、荀卿、到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又从司马相如、扬雄到张衡、蔡邕，下至六朝、唐、宋各代，赋体之文的发展变化，通过选本，揭示一个大体的轮廓，使读者从这里看到“骚体”、“散体”、“律体”以及后人所谓“以文为赋”的“文体”之赋都有怎样的不同，各个时期的赋体之文各有怎样的特征。

再如，同是碑志，从汉末的蔡邕，到中唐的韩愈，从北宋的欧阳修，到南宋的朱熹，他们的碑志文章有怎样的变化。同是碑志之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何不同的特点？蔡邕是汉代碑志之文的大家，但他自己却说只对《郭有道碑》没有愧色。韩愈的碑志之文曾被评为“设墓”之作，但他竟能写得“一篇一样”。欧阳修撰《尹师鲁墓志》，力求简古，而朱熹撰《张浚行状》，文字竟至四万之多。凡此种种，都值得探索。

又如，同是书信，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是发泄牢骚和不平，而绝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则大量模山范

水，有如作赋。明人如袁中郎的尺牍，简直是抒情小品，而清代某些学者的书信则是学术论文。同一体制，其内容和形式，因时因人而异，有如此者。

再说游记，汉代马第伯的《封禅议记》，虽然刻画山水，却不是记游，郦道元的《水经注》模山范水，也不等于游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多是骚体之文，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则简直是议论文章。金元人的游记往往详记里程，袁中郎的《满井游记》等才多写个人情趣。可以看出，这些文章虽然往往选入一书，同属游记，却又如此不同。

总之，现在将某一文体的历代作品选为一编，是可以揭示某些文章发展变化的大概轮廓的。有了这个轮廓，就可以从个别看到一般，从树木看到森林，这对于读者知人论世是大有帮助的。

“丛书”的主编金涛同志要我撰写一篇“总序”，我今未见全书，难发有据之言。只能谈一点预感，讲几句偏见。

1987年7月于北京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各种名胜古迹遍布中华大地。我国的台阁名胜记亦因此源远流长，丰富多采，成为散文园地一枝绚丽夺目的奇葩。

所谓台阁名胜记，是指记叙亭、台、楼、阁、寺、观及其他名胜古迹的一部分杂记类散文。这些记文，或写于亭宇建造的当时，或出于后代观览者的手笔，其内容大抵是记叙建造修葺的过程，历史的沿革变迁，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作者登览游观时的种种感受。文章都以一处或相近几处的台阁名胜作为描写对象，写法灵便多样，不拘一格，或侧重纪事，或侧重状景；有的抒写个人怀抱，也有借端发挥、说理议论的。优秀的台阁名胜记散文，写景状物，则刻划精巧，意境雅远，令人心驰神往；抒写怀抱，则情真语切，品性毕现，读之如晤其面；发挥议论，则见解精辟，理趣横生，引人深思。这类作品，不仅具有历史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审美鉴赏价值。

我国的台阁名胜记，随着观游建筑和宗教寺观的兴起而产生、发展，随着散文创作的繁荣而繁荣。

根据现存的古代文献考察，我国台阁名胜记滥觞于北魏时代，从《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中可见其端倪。

《水经注》是酈道元为《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作者

博采群书，并结合自己游历各地的见闻，为《水经》作注，不仅对原书所记的水道情况详加阐述和补充，而且记叙了这些河流两岸的历史故事、风土景物和名胜古迹。我们把其中描写名胜古迹比较详细的片断节录成篇，已经可以窥见台阁名胜记的雏形。《广德殿》一文，记写一个地处边荒的北魏行宫，勾勒了地理环境，描摹出殿宇的壮美形象，还交代了命名的缘由，虽然尚嫌粗略，但已初具台阁名胜记的格局，成为后代这类记文的一种模式。《大明寺》、《谢玄旧居》等文，描写更趋细腻，文字越加精美，已经略带诗情画意。这种格调对后代名胜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主要记述北魏洛阳的佛寺建筑，兼及有关的人物史事。北魏迁都洛阳后，崇信佛教，大量修建佛寺，极盛之时，“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这种情况，为杨衒之仕京时所熟知。后来朝廷被迫迁都邺城，僧尼转徙，佛寺也毁于兵火。至公元547年，杨衒之因行役再到洛阳，看到“城廓崩毁，宫室倾复，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见《自序》），感慨系之。于是就记忆所及，写了一部《洛阳伽蓝记》。这是一部组织严密、取舍有度的专著。全书以40个大佛寺为重点，系统地追记了洛阳寺塔的分布情况，内容丰富详实，文笔俊丽秀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这部书开创的系统纪实的写作体例，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明代刘侗等人的《帝京景物略》、张岱的《西湖梦寻》等，都是系统忆写一个城市风物的专著，显然受《洛阳伽蓝记》的影响。《洛阳伽蓝记》中的部分寺院、名胜的记文，如《永宁寺》、《凌云台》等，描绘精细，形象逼真，情致动人，也为后世单篇台阁名胜记的写作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独立名篇的台阁名胜记文，在南北朝时期虽已出现，如梁沈约《桐柏山金庭观记》等，但文章体制尚未完备，水平不高，没有多大影响。到了唐代，真正独立、完整的台阁名胜记散文才相继问世。它伴随中唐古文运动的开展而日臻成熟。

初、盛唐时期，乃至中唐以后尚未接受古文运动影响的作家，他们所写的台阁名胜记都是采用骈体文的形式。本书选录的阎伯里的《黄鹤楼记》、郑叔齐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和冯宿的《兰溪龙隐寺东峰新亭记》，都是骈体记文。就文章而论，冯宿的《东峰新亭记》堪称佳作。文章记亭颂主，体度得当。文意含而不露，婉转有致。文辞骈俪典雅，但又没有板滞古奥的弊端。不过总的看来，骈体台阁记有生气的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

唐代最早用古文（即散文）写作台阁名胜记的，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元结，他的《寒亭记》等，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

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将的中唐古文运动，提倡以先秦两汉散文为典范的“古文”，反对六朝以来讲究对偶声韵、堆砌词藻典故的骈文，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经过韩、柳的倡导和实践，创造了一种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和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文体，开拓了文学散文的新领域，丰富了散文艺术的表现手段。在这个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中，台阁名胜记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古文家笔下的记文，大都言之有物，内容充实，抒情寄慨的成分明显增加，语言简明流畅，带有一种清新活泼的气息。

韩愈的几篇台阁名胜记，大都写于仕途失意、遭受贬谪

的时期。在这些作品之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含有一种抑郁不平的感慨。《燕喜亭记》为早年贬官阳山时所作，写一个遭受贬谪的友人筑亭观景，寄情山水，着意揄扬亭主的才德，含蓄微妙地抒泄了怀才不遇的感慨与不平。《记宣城驿》写于晚年贬谪潮州途中，借凭吊楚昭王庙，悲叹由军阀割据、国家衰落所造成的恶果。这两篇文章寓褒贬于叙事，含锋芒于委婉，各有其令人思索的微义。《新修滕王阁记》作于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刺史之后。当时韩愈并未到过滕王阁，却要应命为新修滕王阁作记。（这说明台阁名胜记与游记不同，它可以象碑文一样间接撮取资料来写。）但韩愈善于翻空出奇，另辟蹊径，从切身感受出发，写自己多次想去游阁而未能如愿的遗憾心情，借以突出滕王阁之壮丽无比，令人神往，其间也包含一点仕途不遂心的牢骚在内。可见写台阁名胜记的路子还是比较宽广的。

柳宗元的台阁名胜记数量较多，全部作于贬谪永州和柳州期间。这些作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写景状物细腻生动，形神毕肖。柳宗元自负文笔可以“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这种特长在他的台阁名胜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许多作品都以生动的景物描写引人入胜。《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描写永州北郭的石林胜景，《柳州东亭记》描写柳州城南的山形水势，《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描写桂林訾家洲的风光景色，都能准确地把握景物的特征，运用多变的艺术手法，创造出形象鲜明而又形神兼备的画面，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其次，柳宗元写台阁名胜记，往往融入身世之感，寄寓一种怀才不遇、天涯沦落的感慨。上面提到的三篇文章都描述了自然胜景的发现和开拓过程，对美好事物的被埋没、被弃置，或表示惊讶，或为之叹息，从中不难看出一

个才智之士的不平。柳宗元还有一篇《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不象一般记文侧重于记叙，而是以议论为主，夹叙夹议。文章批判对“息壤”的迷信传说，闪耀着无神论的思想光辉，显示了一个思想家的战斗锋芒。但它又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引证、推理均不作繁琐论述，而只用片言只语亮明观点，进行辩驳，类似科学小品。总起来看，经过柳宗元的写作实践，台阁名胜记不仅扩充了思想容量，而且提高了艺术水平，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

韩门弟子李翱的《题峡山寺》和再传弟子孙樵的《书褒城驿壁》，是两篇别开生面的记文。前者从峡山寺等风景名胜的美中不足之处，借端发挥，提出选拔人材不能求全责备的精辟见解。后者借褒城驿由宏丽而残破的变化，引喻推广，抨击当时吏治的腐败，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这两篇作品借事明理，针砭时弊，为台阁名胜记开拓了一条新路子，提高了它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唐代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专著，那就是玄奘、辩机的《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记述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周游各国的见闻，其中一些描写佛教寺院与名胜古迹的片断，如《鞞罗择迦伽蓝》（见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650页），《帝释窟》（同上769页）等，都是比较完整而生动的台阁名胜记文。

到宋代，我国台阁名胜记散文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成就十分突出，时代特色和个性风格亦很鲜明。

宋代的台阁名胜记继承柳宗元写景寄慨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言情的成分大大增加，以至上升到主导地位，记叙亭台往往成为抒情述志的重要手段。有些作者甚至在作品中袒

露胸襟，把自我形象鲜明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宋初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是他贬官黄州之后的作品。他为自己新建的小竹楼写的这篇记文，用婉转抒情的笔调描写竹楼的清幽环境和登楼赏玩的种种乐趣，借以抒发自己遭贬以后豁达自适而又愤懑不平的复杂感情。文章意蕴深沉，文笔萧疏，风格淡远，宛如一首清新雅致的抒情小诗。《古文观止》评论它可以上追柳宗元诸记，而“起结摇曳生情，更觉蕴藉”，信非溢美之词。此外，这篇文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它开创了为个人住室、书斋作记的先例。这类记文后来一直绵延不绝，成为归属于台阁名胜记的一个分支。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而作，但记楼的文字却很简略，而是因楼写景，借景抒怀，着重抒写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抱负，借以勉励友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襟怀，表现了作者身处逆境而不消极，始终忧国忧民的思想品德，感人肺腑，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文章引之以景，动之以情，导之以理，情理兼备，声情并茂，是我国台阁名胜记中首屈一指的名篇，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开一代文风的人物。散文是他从事改革、发表政见的主要武器，也是他纵谈艺术见解、抒发个人感受的重要工具。他为数不少的台阁名胜记，大多侧重于抒情述志。文章写得纤徐婉转，含蓄隽永，唱叹有情，具有诗的素质。《丰乐亭记》叙写建亭的缘由和过程只是一个引子，而以主要篇幅抚今思昔，抒发感慨。末段所写“与民同乐”的情怀，更显示出作者时刻以国计民生为重的思想境界。全文以“丰乐”二字为眼目，跌宕起伏，反复

咏叹，韵味深醇。《岷山亭记》根本没有描写岷山的自然风貌和亭宇建制，而只是借岷山有关的古事抒发感慨和议论。

《醉翁亭记》更是借山水亭台寄寓感慨的名篇。作者把“醉翁”的自我形象巧妙地安置在作品所描写的场景之中，通过他对景物的见闻和感受来即景抒情。这样，景是人物眼中的景，情是触景而生的情，因而就更加自然地做到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使文章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清代著名的桐城派作家刘大櫟对柳宗元和欧阳修的山水亭台记作过比较，指出：“柳宗元记山水，从实处写景；欧公记园亭，从虚处生情。”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

曾巩的散文接近欧阳修，而又有自己的特色。他的一些台阁名胜记往往借名胜古迹发挥议论，抒写己见，而又情理兼备，思致明晰。《墨池记》以书法家王羲之的临川墨池遗迹为线索，夹叙夹议，突出劝人勤苦学习的宗旨。文章题小旨宏，寓意深刻，结构谨严，语言简洁生动，是一篇富有情致的说理小品。《金山寺水陆堂记》并没有着重描写金山寺的山水形胜、寺观规模，而是就金山寺遇火后迅速重建一事，抒发作者对事业兴废的感想，说明人材对于事业振兴的重要作用。见解新颖深刻，发人深思。文章都是借事明理，但作者能够把叙事与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得波澜起伏，唱叹有致。

苏轼是北宋文学的集大成者，其散文创作成就卓著。他写的台阁名胜记，溶景、情、理于一炉，笔酣墨畅，挥洒自如。文中新情妙理，触处皆是；作者品性，袒露无遗。《喜雨亭记》并没有着力于记亭子，写环境，而是重在写喜雨，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抒发自己与人民同忧共乐的感情。《凌虚台记》叙写凌虚台的修建过程，感叹古今事物的兴废

成毁，勉励人们不要满足于一时的成绩，而要去探求足以长久可靠的东西。见解深刻，意蕴含蓄而有情致。《放鹤亭记》以人物对话的方式发表议论，抒发隐逸之士的无穷乐趣，说明在位者难于享受隐居之乐。《超然台记》以“超然”二字立骨，先议后叙，陈述自己超然物外、澹淡自适的处世态度与生活情趣。这两篇文章所吐露的思想，是作者处境艰危、内心苦闷而又不甘消沉的矛盾心境的一种反映。在北宋激烈的新旧党争之中，苏轼先是自请从朝廷外调，后又屡遭贬谪，处境十分困难，动辄得咎。他无力改变现状，又不甘心就此消极沉沦，于是捡起老庄与世无争的哲学，强作旷达，自我慰藉，以求生存的乐趣。对这种思想我们可以作历史的评判，而作者通过记叙亭台，把自己矛盾交织的灵魂和盘托出，却是值得称道的。

南宋是民族矛盾特别尖锐激烈的时期，散文成了为民族斗争服务的重要工具。在台阁名胜记中，也注入了呼吁抗金救国的时代最强音。洪迈的《稼轩记》，是为辛弃疾上饶带湖新居而作的一篇记文，文中对辛弃疾壮志未酬而打算退隐躬耕表示异议，期望他继续奋发有为，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建功立业。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的《铜壶阁记》，是为范成大重修成都铜壶阁而作的。陆游与范成大情谊深厚，思想上却存在一定的差距。范成大修铜壶阁，主要是为了装点门面。陆游借阁成庆贺之机，希望范成大能在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大业中一展智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文章不少地方语意双关，含蓄委婉，励志爱国的思想却十分明确。

由于宋代的台阁名胜记转向以抒情述志为主，因而作者往往汲取诗词创作的艺术经验，注重立意，讲究构思，追求情景交融的境界。《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岳阳楼记》、

《醉翁亭记》等篇，都以作者的切身生活感受为基础，经过精巧的构思，缘景言情，融情于景，诗情与画意和谐地统一于一体，意境雅深，耐人寻味。从这些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到诗词的影响和散文诗化的轨迹。

宋代的台阁名胜记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平易流畅，疏朗自然，从它们身上已见不到韩文的奇崛和柳文的简古，一般都可以琅琅上口。欧阳修提倡“其言易明而可行”，注重从口语中提炼平易自然的语言来写文章，影响了有宋一代的文风。从欧文的平易流畅到苏文的如同行云流水，标志着宋代散文的语言风格的形成。这种语言风格给台阁名胜记带来了旺盛的生气和活力，使一些名篇佳作能够经久不衰地传诵人口。

元代戏曲昌盛，而诗文较为寥落，没有卓然名世的作家、作品。台阁名胜记的发展也处于低潮。一般作品思想芜杂，艺术不精。但是披沙拣金，也还有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虞集的《小孤山一柱峰亭记》，记亭叙人，写景寄慨，把屹立于长江的小孤山与敢作敢为的李维肃的形象相互映衬，隐含着作者对一代人材的希望。揭傒斯的《昭勇庙卷雪楼记》，意在张扬三国东吴名将甘宁的忠勇精神，文章却写得生动感人。作者面对壮美的大江景色，即景生情，纵情讴歌甘宁的丰功伟迹，抒发对一代名将的怀念之情，构成了情景交融的壮阔境界。萨都刺的《龙门记》，记述作者参观洛阳龙门石窟的所见所感，讥刺耗财佞佛的行为，以议论说理见长。但比之唐宋的说理小品，显得情韵不足。

明清两代，随着整个散文创作的振兴发展，台阁名胜记又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局面。

明初著名散文家宋濂、刘基都有不少台阁名胜记文。宋

濂的《阅江楼记》系奉旨之作，虽文中多歌功颂德之辞，但能寓规于颂，在写景抒情之中，含有劝说帝王励精图治的箴规之言。刘基的《苦斋记》系为章溢的匡山书斋而作，文中所论苦与乐相互倚仗、相互转化的关系，颇含辩证观点，具有发人深思的新意。这两篇文章都夹叙夹议，以议论警切取胜，属于记事明理一路。刘基的《松风阁记》却别出心裁，写得比较空灵。文章分前后两篇，都写会稽山顶、古松荫下的松风阁，却都没有从阁本身下笔，而是抓住“松风”二字，在背景上敷衍笔墨，大事渲染。前篇以议论入题，写松风“旷神怡情”的作用，以自己观游的感受加以印证。后篇描写正午时分金鸡峰上古松的特定情状和声响，创造出一种令人耳聪目明的清旷境界。细品全文，不难看出一个清高志士的理想追求和审美情趣。

明代中叶，复古、拟古的文风盛行不止，统治文坛百年之久。台阁名胜记散文也没有产生什么有生气的作品。直到归有光出现，才以突出的成就，独具的风格，打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在归有光为数不少的台阁名胜记中，写得最好的是《项脊轩志》、《思子亭记》之类凭借亭轩回顾往事、哀悼亲人的文章。这类文章以感情的真挚深厚，细节描写的生动传神取胜，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也为台阁名胜记散文艺术增添了扣人心弦的魅力。归有光有一些亭台记文，是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的。归有光长期受压抑，直到60岁才考中进士走上仕途。《畏垒亭记》就写自己久困安亭，不得进用的苦闷和不平。文章亦以情真意切打动人心。归有光还有一些借题发挥、以议论见长的记文，如《沧浪亭记》等，也写得波澜起伏，自有特色。但不如前两类文章生动感人，印象深刻。

明万历以后，相继崛起的公安派、竟陵派，都反对复古、拟古的文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台阁名胜记也因而有了突破传统束缚的迹象。文章不拘一格，抒写感情更加细腻，表现个人审美情趣更为鲜明突出。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的《灵岩》，记叙苏州灵岩山的名胜古迹，大胆批驳女人祸国的封建传统偏见，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一边描写景物，陈述故事，一边发思古之幽情，抒发感慨评论。全文笼罩着浓郁的抒情气氛，处处表现出作者的审美评价。行文舒卷自如，不拘成格，类乎散记、随笔。竟陵派代表作家钟惺的《浣花溪记》，记叙作者游览浣花溪，参观杜工部祠的情景和感想。文章以游览途径为线索，一路写来，重点落到杜工部祠，发表了一段感想。到文章可以收结时，又补记一笔当日的见闻，对达官贵人假冒斯文来此凑趣表示鄙视，行文比较自由。但文中只见作者移步换形地在那里观赏景物，感情比较冷漠，语言也不够流利畅达。这是竟陵派文章的一个弱点。

明代末年，出现了两部值得重视的专著，一部是刘侗、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一部是张岱的《西湖梦寻》。《帝京景物略》系统地记述北京地区的园林寺观、陵墓祠宇、名胜古迹、岁时风俗等。作者根据自己的阅历，一景一事都如实纪录，有根有据，不作夸饰。《西湖梦寻》系统地记述杭州西湖一带的亭台楼阁、寺观祠宇、名胜古迹、自然景物等。它与作者另一部著作《陶庵梦忆》杂记亲历的往事不同，尽管《陶庵梦忆》中亦有少量的记叙台阁名胜的文字。《帝京景物略》和《西湖梦寻》这两部专著，组织严密，描写细致生动，文字简净秀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直接承继《洛阳伽蓝记》的传统又有所发展，是纪实性的台阁名胜记